

难民危机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

鲍永玲

内容提要 二战后的多次移民潮,使民族主义的欧洲逐步转变为多元文化的欧洲。在这种文化多样性与一体化的矛盾里,欧洲各国逐渐放弃历史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排斥”或“同化”政策,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即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共移民政策。此后欧洲族裔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及其引发的诸种困境,如封闭的平行社会、破碎的价值共识、分裂的国家认同和激化的宗教冲突等,正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发生的。基于此,随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主导文化”的主张逐渐浮出水面。在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中,今天积重难返的欧洲面对的不仅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也是刚刚走上舞台的主导文化主义及其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确定未来。

关键词 难民危机 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社会 主导文化

欧洲难民危机(refugee crisis)或称欧洲移民危机(migrant crisis),主要是指从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中东变局尤其是叙利亚内战之后,从中东、非洲和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经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向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大规模难民潮。这一难民危机尤其在2015年迅速激化成政治、社会危机并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该年共有超过182万非法移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难民和经济移民)抵达欧盟。^①在愈演愈烈的危机面前,尽管欧盟委员会仍然试图维持协调统一的难民政策,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选择闭关自守;作为欧洲避难体系核心的都柏林程序^②及相关法规陷入部分失灵状态,申根协议也被一些国家束之高阁。难民潮发展的迅猛之势不断挑战欧洲战略安全并深刻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欧盟左右翼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欧盟价值观和欧洲认同受到冲击。在旷日持久的难民潮中,英国全民公投“脱欧”,荷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相继举行大选,疑欧主义政党大举进入主流政坛,使已现飘摇之势的欧盟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二战后的历史来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加剧和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欧洲内陆也曾迎来庞大难民潮的冲击。但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报告所指出的,此次“难民在来源国、身份和动机上,都比波黑战争期间带来的难民潮要复杂,给各国难民管理机构带来较大压力”。^③要想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课题(13YJC720002)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20150102)阶段性成果。

① 2014年以前,从陆地和海上非法入境欧盟寻求庇护的人数曾经在1992年(67.2万人)、2001年(42.4万人)和2013年(43.1万人)分别达到高峰;2015年以来激化的欧洲难民危机受到中东变局的影响,其实在2011年就可见端倪,2011—2014年抵达欧盟的难民人数按年度分别是14.1万、7.2万、10.7万和28.4万。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Annual_Risk_Analysis_2015.pdf

② 都柏林程序莫基于1990年欧洲十二国签订的《都柏林公约》以及2003年欧盟颁布的《都柏林条例》,其核心是以“第一入境国”和“安全第三国”原则为基础,允许欧盟国家拒绝审查转经其他欧盟成员国入境的难民所提出的庇护申请,并有权将其移送至有关责任国家。参见黄云松:《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③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Policy Debates*, “Is This Humanitarian Migration Crisis Different?”, Sep.2015, no.7, p.1.

成功应对本次来势凶猛的难民潮,一向秉持人口自由流动和开放边界政策的欧盟国家的已有经验很难奏效。一方面,此次难民潮具有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渊源,中东政局的持续动荡现阶段大规模遣返难以实现,这些涌入西欧福利国家的难民成为事实上的新一波大规模穆斯林移民;另一方面,难民潮的泥沙俱下也使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卷入其中,法国巴黎和尼斯、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英国曼彻斯特相继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以及科隆元旦夜集体性侵案件尤其震惊世界,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排外感陡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要让具有保守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数百万新移民群体,被渐呈分裂之势的欧洲社会成功“消化”,显得更加困难重重。这与欧洲各国三十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所造成的积重难返局面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更多地将焦点集中于这一问题域上。

一、从民族主义的欧洲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

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区,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初次兴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分崩离析,到20世纪末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民族国家始终是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体制形式。即便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描述,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欧洲现状,因为各个民族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着少数民族。欧洲民族国家逐渐成形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即强制同化政策,从而建立起不同族裔的共同国家认同。^① 即便是被公认为民族高度单一的德国,也被沃夫冈·詹克(Wolfgang Zank)指出历史上的德国乃是“大熔炉”(melting pot)。^② 例如二战前德国对世居东部的索布人(Serby)就很严厉,索布语被完全禁止使用。即使2004年德国政府开始保护索布文化,会讲索布语的人也已从19世纪末的15万人下降到5万。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欧美左翼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之后,人们对社会区别的认知核心从阶级身份和阶级差异向文化身份和文化差异过渡,阶级意识形态政治已经逐渐让位于身份认同政治。在这一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欧洲人逐渐开始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认知自我的社会属性,他们不再以政治学概念来定义社会团结,而是以族群、文化或者信仰来定义。随着南斯拉夫解体、爱尔兰共和军与西班牙巴斯克埃塔组织的停火、以及旧殖民地瓦解后移民潮的涌现,新欧洲的民族问题和认同问题主要体现在了移民问题上。2014年欧盟国家总人口中有3357万居民在欧盟以外地区出生,占总人口的7%;从2010—2013年,每年有约140万非欧盟移民(不包括难民和非法移民)经正常途径进入欧盟。^③ 荷兰学者保罗·舍夫(Paul Scheffer)指出,与通常认为美国是移民国家而欧洲是单纯的民族国家之印象不同,欧洲社会实际上非常依赖于移民,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些经济中心和大城市几乎50%的人口都是外来移民;20世纪50—60年代后西欧大量输入移民劳动力,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已经占欧洲总人口20%,与美国的移民数量几乎持平。^④

二战是欧洲从移民输出国转为接纳国的重要转折点。战前欧洲大陆移民总趋势是近似19世纪的移民传统,从欧洲大陆迁移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战后这一进程被逆转,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包括前殖民地的移民进入欧洲大陆,欧洲逐渐由传统的民族国家转变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⑤ 面对多次移民浪潮,在需求和排斥的矛盾心态里,各国逐渐放弃了将移民族群和接收国主流

① 叶寒:《西方民族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9期,第41—45页。

② Wolfgang Zank, *The German Melting Pot: Multicultur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pringer Verlag, 1998.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Immigration in the EU”, http://ec.europa.eu/dgs/home-affairs/e-library/docs/infographics/immigration/migration-in-eu-infographic_en.pdf

④ 保罗·舍夫:《欧洲,不要再提“多元文化”了》,载《观察者》,2013年5月10日。

⑤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族群视为一体的传统民族主义同化政策,而采取了更为灵活、开放甚至可以说是权宜之计的多元文化主义公共政策。^① 具体来说,欧洲采用的移民文化政策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同化模式或共和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分化排斥或部分排斥模式;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模式。^② 这三种移民政策是各国在对外来文化融合与排斥的矛盾心态下形成的选择,但它们始终经历着动态的发展并在左翼政府执政期间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

首先,法国的同化模式(assimilation model)或“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试图以制度化的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带来的公民身份共同性,甚至因此故意不登记人的宗教信仰,认为政教分离的世俗性原则一定能够瓦解宗教性社群的反抗而将社群拆解为平等的公民个体。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大量进入法国,他们带来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强烈冲击,在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里深受撼动的法国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强硬的同化政策,而采用了密特朗所说“成为不同的自由”(le droit à la différence)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反歧视”口号荫庇下逐渐放任自流的移民社群,使那些似乎被人遗忘的“边缘法国”的现象愈演愈烈,^③也使法国社会和日趋壮大的穆斯林社群之间关系日趋紧张。随着勒庞家族(Le Pen)领导的右翼“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崛起带来的政治压力,萨科齐政府在2010年重新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共和模式,如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穿戴罩袍等。然而,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更,将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社群及其努力推行的伊斯兰教法视为对法兰西传统价值的威胁,这同时却也恰恰强化了伊斯兰文化在法国现实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其次,德国的分化排斥(differential exclusion)或部分排斥模式(partial exclusion model),主要体现在二战后长期施行的客籍劳工(Gastarbeiter)制度,即将前来工作的外来移民部分纳入特定福利体系,但提高获得永久居留和德国公民身份的难度,使其难以参与政治活动并避免形成少数民族社区。^④ 但随着德国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已经事实上拥有大量移民族群的德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进行了结构性的移民政策改革,部分允许双重国籍并引入了属地(ius soli)给予国籍原则,转向承认和促进多样性的多元文化公共政策。^⑤ 这一举措加速了德国社会多元化的进程,难民潮前德国穆斯林人口已经有一半拥有德国国籍并在25岁以下。难民危机里涌入德国的百万难民潮更是加剧了人口结构巨变的趋势,也使德国社会与穆斯林族群的矛盾冲突达到最高点。2016年的迪麦颇(Infratest dimap)民调显示已有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伊斯兰并不属于德国”,^⑥而“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运动的影响力也从德累斯顿、柏林和科隆等扩展到欧洲各大城市。

① 在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具体内容、出台背景和实施效果等方面,近期相关学术文献较多,例如岳伟、邢来顺:《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问题与统一后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载《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田焯:《法国民族主义理念下的多元文化主义》,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王璐、王向旭:《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转向》,载《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9期;韦平:《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的成与“败”》,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杨洪贵:《荷兰少数民族政策初探》,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等等。

② Stephen Castles, “How Nation-States Respond to Immigration and Ethnic Divers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21, no.3, 1995, pp.293-308.

③ Christophe Guilluy, *La France périphérique. Comment on a sacrifié les classes populaires*, Paris: Flammarion, 2014.

④ Stephen Castles and Alastair Davidson (eds.),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60.

⑤ 宋全成:《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载《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86—93页;黄叶青、彭华民:《迁移与排斥:德国移民政策模式探析》,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3—129页。

⑥ WDR Fernsehen und WDR 5, “Für fast zwei Drittel der Bürger gehört der Islam nicht zu Deutschland”, 12. 05. 2016, https://presse.wdr.de/ploungue/wdr/programm/2016/05/20160512_ihre_meinung_umfrage.html

最后,英国“多元文化模式”(multicultural model)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伯明翰 1985 年移民族群暴乱事件后实行的雨伞群组(Umbrella Groups)政策。^① 这种政策尤其被工党政府所推行,强调各个族群“成为不一样”的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因种族、族群、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别而有所不同。由此,黑人和亚裔的社群和组织领袖被有意识带入主流政治,以促进其成员在公共政策上做出表达。然而,由于雨伞群组在定义其成员和集体授权上有困难,这种政策反而加剧了各个族群之间的竞争和壁垒,^②形成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的社群之间充满鸿沟并足以爆发暴力冲突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③ 2001 年英国北部城市种族骚乱后,英国政府着重推行“社区凝聚”(community cohesion)政策,试图促进公民融入、打破族群藩篱。^④ 然而,该政策仍然属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修正之一,其成效并不显著。2005 年 10 月在伯明翰再次爆发种族骚乱,这是英国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负面效应的缩影,也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011 年坦承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的背景之一。

在这些政策模式的基础上,欧洲在近三十年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这尤其体现在各国国民人口结构及相应的种族、语言、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特点的变化。“多元文化社会”作为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和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社会理想,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彼得·基维斯托(Peter Kivisto)曾指出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在此社会中以尊重的态度来欣赏并宽容各种差异”。^⑤ 这一理想尤其体现在哈贝马斯以“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取代族裔爱国主义、以建构“后民族的”新型多民族国家的设想中,即各族群在尊重差异和彼此认同的商谈政治基础上,将自己拥有的文化传统和宪法基本价值原则相结合,形成开放和谐的公共政治文化。^⑥ 但在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看来,这种多元文化社会的理念纯粹是“知识分子的幻想”。^⑦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其榜样是经过启蒙洗礼之后的基督教,即要求宗教退回私人领域而不影响政治公众生活。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左翼运动浪潮更加促进了世俗主义共识在现代欧洲社会的根深蒂固,却同时也吸干了基督教的精神和灵性力量,造成了它的衰落,仅仅在政治生活中留下一些宗教残余。尽管福山所谓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传统在欧洲仍然存续,^⑧但在部分削弱民族国家主权而以抽象人权价值观为基础的欧盟理念里,基督教的精神根基已经基本被废弃。^⑨ 在欧洲基督教急剧衰落的同时,穆斯林移民族群信奉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却生命力日趋强盛,并与欧洲传统价值认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也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⑩

① Kenan Malik, “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munity Versus Society i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② 塞西尔·拉博德(Cécile Laborde)也指出,英国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区分不同种群而有着潜在的隔离主义倾向,其努力方向不是期望各族群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而是国家将自身许多功能委托给私立学校、教会、地方共同体等,鼓励形成小群体的认同,造成了强大的离心力。参见 Cécile Laborde, “Which ‘Multiculturalism’ has Failed, David Cameron?”, *Eurozine*, 21. 02. 2011,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1-02-21-laborde-en.html>

③ Amartya Se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Multiculturalism; Chili and Liberty”, *The New Republic*, vol. 27, no. 2, 2006, pp.25-30.

④ 胡雨:《英国穆斯林族裔及其社会融入:回顾与反思》,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 5 期,第 27—36 页。

⑤ Peter Kivisto, *Multiculturalism in Global Society*,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2, p.152.

⑥ 尤尔根·哈贝马斯,伍慧萍、朱苗苗译:《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⑦ Moritz Müller-Wirth, Theo Sommer, Martin Spiewak, “Im Augenblick sind die Deutschen in derselben Stimmung wie ich: Leicht angekränkt und infolgedessen schlecht gelaunt”, *Die Zeit*, Nr.18, 22.04.2004.

⑧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25.02, 2007.

⑨ 例如 2004 年制定但后来并未通过法国和荷兰公投的《欧盟宪法》(*European Constitution*),洋洋七万字却无一字提到上帝。该宪法在序言谈及欧洲的根基时明确提到希腊罗马文明和启蒙运动,对基督教却不置一词并含混地以“灵性动力(spiritual impulse)”一笔带过。参见崇明:《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载《开放时代》,2017 年第 2 期。

⑩ 陈季冰:《欧洲的悲剧》,载《经济观察报》,2015 年 2 月 2 日。

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

西欧宽松的移民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其中约90%是北非、中东、西亚和南亚等地区的穆斯林族群。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2012年欧洲共有4349万穆斯林;德国的476万穆斯林大多数来自土耳其;法国的471万穆斯林移民来自前西非、北非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英国的296万穆斯林主要来自加勒比海、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等。^①由于穆斯林族群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族群,预计全球穆斯林族群在2065年左右将彻底超越基督徒达到三十亿以上的人口规模。^②而从欧洲来看,从二战后屈指可数的穆斯林到现在快速增长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数量、社群规模、宗教影响力及其对欧洲价值的抵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巨大挑战。

总体来说,欧洲穆斯林社群中伊斯兰教的激进化趋势日趋严重,而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伊斯兰教保守趋势的迅速兴起近乎一致。在欧洲个体权利意识强化、欧洲文化认同缺失和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削弱的同时,在多元文化主义荫庇下逐渐丧失本土羁绊的穆斯林移民却产生了强烈的对普世性伊斯兰共同体即“乌玛”(Ummah)的认同。^③考虑未来欧洲移民来源趋势和各族裔人口出生率等因素,所谓“多数”或“少数”民族的概念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质变,此次激化的难民危机更是大大推进了这一变迁速度。皮尤研究中心本来预计,德国到2020年自然增长达到的穆斯林总数是553万、法国543万和英国395万。^④然而仅仅德国2015年登记的避难申请者就达109万,其中近72%是35岁以下的年轻男性穆斯林,^⑤大致相当于德国本土同年龄段人口的20%;^⑥2016年登记的难民数量仍达32万,在宽松的避难政策下他们随后还将带来数量庞大的团聚家属。在这样连续数年以青年穆斯林为主体的难民大潮冲击之下,预计高生育率的穆斯林移民族群在欧洲各国渗透和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已显现巨大流弊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 封闭的平行社会

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常见的批评是它导致大量割裂的“平行社会”,即各个少数民族群、主流社会间皆相互隔绝并存,宛如“难以同化的孤岛”。印度裔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学者柯南·马里克(Kenan Malik)就认为,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是为了防止形成碎片化的社会,其实质却是让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部落化。^⑦正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时指出的,穆斯林社群日趋边缘化,族群间的隔膜日趋僵硬,族际差别开始以阶级差别、职业差别、教育差别、信仰差别甚至街区差别的形式固化下来。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中,大散居、小聚居格局的“独立社区”形成重重“玻璃门”,使人一日之间如同行走于几个国家,比如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伦敦的诺丁山区、斯德哥尔摩的胡斯比、乔德布拉街区和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共政策促使政府介入民族和族群身份的刻意认定,人为强化了各个族群之间的自我认同,实质上阻断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Muslims”, 18.12.2012, <http://www.pewforum.org/2012/12/18/global-religious-landscape-muslim/>;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Explore the Rapidly Changing Religious Profile of the World through 2050”,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Changing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04.05.2017, http://www.pewforum.org/2017/04/05/the-changing-global-religious-landscape/?utm_source=adaptivemail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17-04-05%20projections%20update&org=982&lvl=100&ite=929&lea=199751&ctr=0&par=1&trk

③ Olivier Roy, *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

④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

⑤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Zahlen zu Asyl in Deutschland”, <http://www.bpb.de/politik/innenpolitik/flucht/218788/zahlen-zu-asyl-in-deutschland#Antraege>

⑥ Thilo Sarrazin, “Hätte man auf mich gehört, gäbe es heute keine Af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04.2016.

⑦ Kenan Malik, “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munity versus Society i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自然交融。“民族”也由自然融合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变成人为划分并能部分获得政治利益倾斜的政治现象。人们共享的文化、宗教和语言都被割裂了,各个移民族群的传统文​​化仍旧具有引领社会心态与价值取向的强大惯性,独立社区越来越突出各自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伦敦就是这样被切分成非裔黑人聚集的东南部伦敦和印巴人聚集的西伦敦。而这样遍布四分五裂的“平行社会”的后果,则是使国家因缺乏共同的文化黏合剂和价值认同而丧失对民众的权威性。^①

在拥有 300 多万穆斯林移民族群的英国,艾克姆(ICM)调研机构对超过 1000 名英国穆斯林(男性多于女性)进行了题为“英国穆斯林到底想要什么?”的民意调查,这些穆斯林来自那些穆斯林已超过居民总数 5% 的区域。调查结果显示,5% 的英国穆斯林赞成对通奸者进行石刑并认为合法;39% 认为妻子始终从属于丈夫;31% 认为一夫多妻制可以接受;23% 坚信人们应该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而不应假装将英国法律当作行为框架;52% 认为同性恋不合法、只有 18% 认为是合法的;35% 认为犹太人在英国拥有过多权利;80% 的穆斯林对他们的生活非常满意、并觉得自己才是新一代英国人。^② 英国国家男女平权和人权委员会前主席特雷沃·菲利普斯(Trevor Phillips)就此指出,实际上大多数英国穆斯林社群根本不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他建议政府需要采取更好的融合措施。例如英国公立学校应该控制不要让穆斯林学生比例超过 50% 以上,要进行“英国价值”教育并开设公民课程;要改变教育界过分向伊斯兰文化传统妥协的倾向,例如允许用学校广播宣礼、允许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不参加游泳课以及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募捐等,尽管这些事实上已是常态。

(二) 破碎的价值共识

在对二战深刻反思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欧洲左翼要求以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为基础来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一种更高层次的以欧洲公民和世界公民为旨归的共同体认同。然而,政府并不勇于在穆斯林移民族群中大力宣扬这种世俗性的主流价值观。过分张扬的普遍人权话语和肯定性的社群认同政治所形成的新政治正确,使这种宣扬容易被视为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歧视,从而破坏了多元文化主体价值权利的平等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过分注重文化权利的平等和“分”(divisiveness),反而形成了公共领域的价值观空缺。这样一来,缺乏强有力整合纽带的社会宛如搅拌在一起的水果沙拉,只是大量平行社会的并置,缺乏能够在不同文化间有效通约的确定价值观或行为方式。这不仅使移民社群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反而使其更坚持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及其宗教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在文化价值观念日趋分裂和一人一票民主政治下的欧洲,在人口结构上日渐占据优势的穆斯林族群也越来越善于利用宽容、民主、自由、多元等主流价值观和人权政治话语来为自己辩护,并进而在欧洲残留的社团主义传统背景里将自己的宗教诉求和宣示不断向公众领域推进,达到强化自己独特的伊斯兰宗教共同体认同的目的。这些要求又往往得到欧洲左翼政党和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支持甚至赞许。例如英国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工党政治家萨迪克·汗(Sadiq Khan)在担任布朗影子内阁交通大臣时,手按《古兰经》而非《圣经》宣誓就职;而奥地利新当选的原绿党总统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最近则呼吁全体女性国民为了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都戴上头巾。^③

事实上,对于欧洲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宗教教法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全方面地渗透,使其更近似于一种一元性神权政治体系,而无法像政教分离后的基督教那样区分出世俗领域和

^①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曾花费十年调查 40 个美国社区的 26200 人,发现一个社区越是种族多元化,成员之间越是缺乏信任;种族多元的社区“不信任当地市长,不信任当地报纸;他们拒绝相信他人,更不会相信社会机构”。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② ICM, “What Muslims Really Think”, <http://www.icmunlimited.com/polls/icm-muslims-survey-for-channel-4/>

^③ Anna Kröning, “Van der Bellens Tag, an dem alle Frauen Kopftuch tragen”, *Welt*, 26. 04, 2017.

神圣领域。也因此,欧洲穆斯林社群内部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大量的伊斯兰教法法庭,它们往往游离在官方法律边缘充当仲裁社群成员家庭问题的角色,也挑战作为整体政治秩序的世俗性。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曼·威廉姆斯(Roman Williams)甚至提出一些伊斯兰的教法因素可以纳入英国司法体系,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①这种价值观的碎裂,还表现在欧洲穆斯林社群仍旧保留一些与欧洲原生族群格格不入的保守习俗,如要求女性穿戴面纱罩袍、拒绝握手、男女在公共区域的相互隔离、一夫多妻、童婚、强迫婚姻、割礼和荣誉谋杀等。同时,穆斯林移民社群对原生文化的挑战、拒绝融合以及大量的移民犯罪问题,同样造成移民接受国原生族群的强烈反弹,不仅引发新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②也使国内种族关系日益紧张并造成族群间的冲突,甚至使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哀叹欧洲出现内战的危险。^③而欧洲穆斯林社群不断激进化、保守化的宗教倾向以及日趋频繁的恐怖主义圣战活动,也对欧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形成了严峻挑战。

(三) 分裂的国族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民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关系到任何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在欧美,随着三十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传统民族国家秩序受到挑战,国家认同始终处于动荡和再造的过程之中,国家认同的分裂日益成为隐忧。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中,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拥有规模庞大且成熟的移民社群,但当时文化差异和国家认同并未成为决定性的问题。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认为,1985年到2000年是欧洲穆斯林的政治觉醒期。^④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正经历更大更复杂的转变,共产主义阵营逐渐崩溃、左派意识形态正在退潮,1979年伊朗革命和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战争则培育着欧洲穆斯林社群更敏感的身份认同。此时,具有普世追求的伊斯兰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左翼群体和穆斯林社群共同追求抗争的新意识形态。^⑤大多数是左翼执政的欧洲福利国家此时不约而同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对这种新的穆斯林共同体认同的形成与盛行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⑥在多元文化社会框架中,移民族群被归整为单个封闭的文化群体,移民个人身份认同的复杂、多变和矛盾性却被忽略了。穆斯林社群更倾向于只认同自己的宗教族群,这构成了一种对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及自由主义政治方向的拒斥。欧洲穆斯林社群将伊斯兰教认同为个人努力的具有集体概念的政治与道德理想,从而更愿意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而非本国的非穆斯林公民视为同胞。在这种政策模式下,多元文化的权利(multicultural right)得到大力张扬,国族的团结性(national solidarity)却受到了破坏。

本来,欧洲传统民族国家有着强制同化政策,而美国则有着令人自豪的文化熔炉。然而,在试图创造“后国家的”欧洲身份认同的欧盟层次上,多元文化效应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已经像有机体

^① Daniel Pipes,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Islamic Law", *Jerusalem Post*, 13. 02, 2008. 英国司法协会甚至就如何根据伊斯兰教法撰写遗嘱并使之得到英国法律体系的承认,在2014年提出相关的指导意见。John Bingham, "Islamic Law is Adopted by British Legal Chiefs", *The Telegraph*, 22. 03, 2014.

^② 益普索(Ipsos)集团2011年"Global Views on Immigration"的调查显示,56%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移民过多,分别是比利时72%、英国71%、意大利67%、西班牙67%、德国53%、法国52%;对移民总体是积极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大约只有17.5%的欧洲人包括瑞典和波兰认为主要是积极影响,认为主要是负面影响的人数分别为比利时72%、英国64%、意大利56%、法国54%、德国54%。Ipsos, *Global Views on Immigration*, August, 2011, <http://www.ipsos-na.com/download/pr.aspx?id=10883>

^③ Islam-Experte: "Lage in Europa soll sich zu Bürgerkrieg entwickeln", *Huffpost*, 10. 09. 2016.

^④ Jonathan Laurence, *The Emancipation of Europe's Muslims: The State's Role in Minority Integ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9.

^⑤ Philip Jenkins, *God's Continent: Christianity, Islam, and Europe's Religious Crisis*, Oxford, 2007, pp.130-131.

^⑥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然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真正被普遍接受和纳入各国移民文化政策,却恰恰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难民潮的冲击并与其息息相关。2010—2011年欧洲多国元首宣布其多元文化移民政策失败,其背景虽然是针对国内骚乱,这些骚乱却恰恰主要由近年来随着多次难民潮和移民潮涌入西欧、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移民族群所引起。

内部的溃疡令人担忧。如今欧盟在不断扩展,吸纳越来越多的成员国,逐渐从同质的共同体变成异质、多元的共同体,而欧盟的基本理念限制了为自己设定清楚边界的可能性。随着欧盟不断扩展、其外部边界不断变化,对一个具有扩展开放性的欧盟共同体价值观的认同也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拥有着“超多样性”(super-diversity)的欧盟还要应对内部不断壮大又未被同化的移民群体,共同体的认同日益瓦解。随着穆斯林族群在欧洲的迅速增长,“欧拉伯”(Eurabia)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隐忧。^① 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更是不仅关系到欧美各国的民族认同,^②而且还关系到欧盟各国未来的兴衰和走向。

(四) 激化的宗教冲突

现代欧洲的社会文化仍旧根植于基督教传统,但是在启蒙基础上已经达到政教分离,将宗教严格限制在公共政治边界之外;而欧洲穆斯林族群文化根植于崇信的伊斯兰宗教传统及其教法,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倾向。^③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政治正确的包容使欧洲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法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分裂,而伊斯兰化问题又是其中最富争议的焦点,给现行所有欧洲国家政府带来了重大挑战。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趋势,是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利用石油资金,向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保守而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包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非洲和欧洲。在这些外部力量的影响下,欧洲一些穆斯林移民社群已出现较为严重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并利用多元文化主义的宽容来推行其极端主义的不宽容。^④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追求以教法全面支配穆斯林共同体,以暴力“圣战”(Jihad)和非暴力“移居”(Hijira)的双重方式维持并扩充穆斯林社区,主张政教合一并最终征服异教徒的土地;而欧洲左派主流媒体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却热衷于批判解构基督教文化传统、民族主义传统,认为批评伊斯兰就是种族主义,以多元文化为名容忍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价值体系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渗透。

2009年盖洛普(Gallup)对法国穆斯林社群的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强烈或极其强烈地认同伊斯兰教,只有23%的普通法国人这样认同基督教;英国在这方面的对比则更为鲜明,为75%比23%。此外,70%的英国穆斯林和82%的德国穆斯林认为,宗教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也显示,对国家和宗教谁先谁后的问题,81%的英国穆斯林首先认同后者,只有7%的英国基督徒会这样选择。^⑤ 按照2015年的统计结果,目前英国至少有85个正在运作的伊斯兰教法法庭,拥有1834个清真寺和礼拜场所,与1700座英国国教教堂分庭抗礼。^⑥ 2012年的调查显示72%的德国土耳其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唯一正信,46%希望有一天伊斯兰教在德国取代基督教。^⑦ 2013年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对德国穆斯林的调查显示,三

^① Bat Ye'or,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Cranbury,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1.

^② 在被称为移民熔炉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在侵蚀亨廷顿所指出的、作为美国认同核心族裔和种族要素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即盎格鲁-萨克森的新教白人文化,美国的核心文化和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也在遭到质疑。Samuel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5.

^③ 黄平指出,欧洲穆斯林移民有强烈的认同焦虑问题,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更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欧洲蔓延并引起种种政治后果。它要求在跨国层面对伊斯兰教进行复兴,其所持的宗教观点是经典主义的,相对封闭而保守,拒绝国家或中央维度,并支持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目前,这种原教旨主义在欧洲社会体现出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去文化化和再伊斯兰化、个体化、对“圣战”重视等几个明显特征。参黄平:《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基于奥利维耶·罗伊“新原教旨主义”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

^④ Alexander Kissler, *Keine Toleranz den Intoleranten: Warum der Westen seine Werte verteidigen muss*,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5, S.4.

^⑤ Jocelyne Cesari, *Why the West Fears Islam: 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⑥ *UK Mosque Statistics/Masjid Statistics*, http://www.muslimsinbritain.org/resources/masjid_report.pdf

^⑦ Liljeber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eutsch-Türkische Lebens und Wertewelten 2012*, July/August 2012, p.67; *Türkische Migranten hoffen auf muslimische Mehrheit*, *Welt*, 17. 08, 2012, retrieved 23. 08, 2012.

分之二的受试者认为伊斯兰教法比国家法律更重要,60%不能接受同性恋者作为朋友,45%认为犹太人不可信任,45%觉得西方世界要毁灭伊斯兰文明;与此相比,调查德国本地人的结果分别只有13%、9%和23%(最后一项问题为“是否觉得伊斯兰文明要毁灭西方世界”)。^① 众多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出欧洲大部分穆斯林坚守传统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兴趣淡薄,或者策略性地参加民主政治力图谋取更多的伊斯兰政治影响力。^② 近年来,从2004年荷兰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因拍摄批评穆斯林社会女性状况题材的电影被害、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火车爆炸案,到2005年伦敦公交系统自杀炸弹袭击、该年秋天席卷法国各大城市的暴乱、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漫画引发的抗议,到2011年和2015年巴黎两次大规模恐袭、2016年元旦德国科隆集体性侵、2016年2月布鲁塞尔大规模恐怖袭击、2017年5月英国曼彻斯特和6月伦敦大规模恐怖袭击等一连串标志性事件,都被解读为欧洲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失败以及欧洲伊斯兰化的进一步加深。

三、从多元文化主义到主导文化主义

从欧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路径及其效果来看,作为其根基的政治哲学思想和多元文化社会理念皆隐藏着深刻的悖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9.11”事件以及欧洲各国多次大规模暴乱、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才逐渐得以突破政治正确的禁忌。默克尔、萨科齐、卡梅伦和菲尔哈亨等德、法、英、荷主流政治家,近年来相继公开承认本国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已经失败的言论,更是引发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在这一背景下,以“主导文化”来取代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主张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其讨论几受压制,但在近二十年来已逐渐成为欧美保守主义尤其是中右翼政治党派的共识,并成为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强理论资源。这种主导文化主义或主张以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根基,或主张以基督教传统及各国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各有其特点,既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其中,因二战历史背景与之后长期受压制的国家民族认同等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德国成为新兴主导文化观念的首要倡导者,并较早就将其吸纳入到中右翼主流政党的执政纲领之中以希付诸实践,使其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主导的思潮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主导文化”(Leitkultur)本身是一个德语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却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民族文化。它作为一种反抗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思潮与理论主张,近二十年来在欧洲各国随着不同的政治语境呈现出多样的表达形态和政策指向。该词可以翻译为主导文化(guiding culture)、核心文化(core culture)和原生文化(authentic culture)等,也有法语译为参照文化(culture de référence)。这些译词只是反映了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的某个侧面,因此该理论提出后尽管引起了欧美学界的激烈探讨,但在大部分讨论语境下如福山、齐泽克和哈贝马斯等都直接使用“Leitkultur”一词。这个观念由叙利亚裔德国学者巴斯姆·蒂比(Bassam Tibi)在1996年《多元文化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丧失》一文里首次提出,在1998年《没有认同的欧洲》里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发展。^③ 他在这里以“欧洲主导文化”(europäische Leitkultur)概念来描述欧洲人和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性价值共识,即

^①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s Widely Spread*, <http://www.wzb.eu/en/press-release/islamic-fundamentalism-is-widely-spread>

^② 黄平:《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

^③ Bassam Tibi, “Multikultureller Werte-Relativismus und Werte-Verlus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52-53/96, 1996, S.27-36; Bassam Tibi, *Europa ohne Identität? Die Krise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 München, 1998 (Taschenbuch-Ausgabe mit dem Untertitel: *Leitkultur oder Werte-Beliebigkeit*, Berlin, 2000).

与宪法相关的“自由的民主基本秩序”。此后,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民盟多次将“德意志主导文化”(deutsche Leitkultur)的议题推到公众舆论前台,主要是为了讨论德国的移民融合和核心价值问题。^①然而,由于德国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情境,国家民族认同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尴尬的议题。“主导文化”被主流左翼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对移民的种族歧视,也被视为德国要回到二战前灾难性的文化倒退。2000年,“德意志主导文化”甚至被庞斯(Pons)辞典的编辑选为“年度恶词”。

由于这场争论的主导推动者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右翼传统政党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个主张从初始就迎来了左翼政党如社民党、绿党、左派党及相关学者的强烈批判。^②宪法爱国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哈贝马斯在2002年就指出,“在一个民主的宪法国家,多数要允许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形式——只要他们不偏离这个国家的共同政治文化——这不用规定所谓的主导文化”。^③2006年他再次表态:“文化的‘自然保护区’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在民主法治国家,多数人不允许把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规定为主导文化,僭越国家共同的政治文化,压制少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④比勒菲尔特(Heiner Bielefeldt)、戈茨(Irene Götzt)和经济学家施特劳普哈尔(Thomas Straubhaar)等,也从哲学和民族学等角度赞成废弃主导文化观念一词。^⑤由于哈贝马斯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旗手的影响力,他在这场争论中以英语撰写的批判和否定主导文化的文章很快引起了欧美舆论的关注。但与德国国内主要是否定态度不同,欧美学界反应不一:如新保守主义者福山认为主导文化是一种纠偏左翼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有益尝试;^⑥激进的极左翼学者齐泽克同样认为欧洲需要更高层次的“主导文化”,要以普遍主义的启蒙解放来规范亚文化互动的方式并抑制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发展。^⑦

从主导文化观念的发展历程来看,可发现其从提出之始,所谓欧洲主导文化和德意志主导文化的界定都非常的宽泛,实际上指涉的往往只是以宪法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随着讨论的深入,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启蒙传统等也作为欧洲主导文化的深层根基被认识到。在此基础上,法兰西文化传统(civilisation française)、荷兰传统价值观、英国性(Britishness)和英国核心价值(British core values)等也得到了讨论和界定,成为各国主导文化主张的不同表现形式。^⑧近年来,主导文化更多地被各国传统或新兴中右翼政党所主张,针对欧洲伊斯兰化这一现象,要求彻底取代多元文化主义达到对移民的文化融合,各国以各种表述形式对本国主导文化的阐释也越来越细

① Jörg Schönbohm, “Die letzte Utopie der Linken wird auch scheitern”, *Berliner Zeitung*, 22. 06. 1998; Theo Sommer, “Der Kopf zählt, nicht das Tuch-Ausländer in Deutschland: Integration kann keine Einbahnstraße sein”, *Zeit*, Ausgabe 30/1998; Friedrich Merz, “Einwanderung und Identität”, *Welt*, 25.10. 2000; Norbert Lammert, “Auch die EU braucht ein ideelles Fundament”, *Welt*, 13. 12. 2005.

② Martin Ohlert, *Zwischen Multikulturalismus und Leitkultur: Integrationsleitbild und-politik der im 17. Deutschen Bundestag vertretenen Parteien*, Springer-Verlag, 2014.

③ Jürgen Habermas, *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Auf dem Weg zu einer liberalen Eugenik?*, Frankfurt/a.M., 2002, S.13.

④ Jürgen Habermas, “Are There Postmetaphysical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Good Life’?”, *Modern Philosophy*, vol. 5, 2006, pp.1-7; 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形而上学能否回答“良善生活”的问题?》,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5期。

⑤ Heiner Bielefeldt, *Menschenrechte in der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Plädoyer für einen aufgeklärten Multikulturalismus*,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5, S. 71 ff.; Navid Kermani, *Wer ist Wir? Deutschland und seine Muslime*, C.H. Beck, 2010. Daniel Bax, Thomas Straubhaar, “Ökonom über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 muss sich neu erfinden”, *taz*, 20. 07. 2016. Irene Götzt, *Deutsche Identitäten.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Nationalen nach 1989*, Köln: Böhlau, 2011, S.81f., S.128.

⑥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25. 02. 2007.

⑦ Romain Leick and Slavoj Žižek, “The Greatest Threat to Europe Is Its Inertia”, *Spiegel*, 31. 03. 2015.

⑧ 如英国工党前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和布莱尔(Tony Blair)提出了“英国性”(Britishness)、“英国核心价值”(British core values)或“英国人的共享价值”(British shared values)概念;法国共和党前总统萨科齐希望用法兰西文化传统(civilisation française)来对移民进行“共和同化”(assimilation républicaine);而德国传统保守主义联盟党、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则提出“德意志主导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做了界定。

致、深入和具体。其接地气和拥有丰富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根基的特点,也使主导文化的主张区别于往往沦为抽象理论原则或权宜性框架的多元文化主义。从内涵和外延来看,作为争议议题的主导文化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三个层次:即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

首先,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观念主张的底层根基有两种:一种是蒂比主张的非种族性以公民意识为基础的“欧洲观念”,包含理性优于宗教启示、政教分离、民主、多元主义和宽容等;^①另一种是欧洲各国主流中右翼政党所主张的,以犹太-基督教、古典人文主义、启蒙传统和现代民主价值观等共同作为欧洲主导文化的基石,后一种主张在目前影响力更大。其次,由欧洲主导文化观念引申出来德意志主导文化、英国性、法兰西文化传统和荷兰价值观等关于国家主导文化的多样提法,本国的“语言”始终被视为国家认同的坚实核心,与此相关的争论也往往与移民法、国籍法的改革相缠绕。在传统中右翼政党里,这一主张体现在各国陆续实行的入籍考试、融合课、语言课或公民课程;而在欧洲各国新兴的所谓反建制的新右翼政党那里,则出现了法国第一、荷兰第一、奥地利第一等提法,并要求保护和坚持传统的基督教节日庆典及社会习俗,禁止引入伊斯兰节日和不允许更多的穆斯林移民。这一政治争论往往围绕着“何谓德意志”、“何谓法兰西”等关系到国家认同的核心论题。最后,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主导文化的理解往往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从更细化的角度来说,由于国家民族认同总是围绕着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而形成,包括象征、英雄和传说,由此而形成的地区性文化包括庆典、节日、风俗、食品、服装、集市等,也被纳入到必须继续坚持和得到倡导的乡土主导文化的理解之中。^②此外还可延伸到传统价值观包括家庭、生育、教育和社交观念,在文化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背景下的回归,等等。

从以上剖析的主导文化的三个内涵层次上来看,其深层内核仍然是源远流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后者有可能成为重新凝聚跨国欧洲文化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精神根柢。这是因为基督教从中世纪就开始“涵化”欧洲民族并给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③在历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全球化之后,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传统在欧洲政治文化体制乃至普世价值观之中仍有着残迹和深刻的影响力。而这种具有深厚文化保守主义根基的主导文化观念的主张,一旦成为公共移民政策并在各国得到推行,在事实上也会造成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精神在欧洲的重新复兴。

总体来看,近二十年来主导文化观念在欧美逐渐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政策负面效应的纠正与反动。也正因此,这一主张始终受到欧美左翼力量在政治、媒体、学术和教育界的强烈批判与抵制。文化保守主义发起的几次关于主导文化的公众讨论在试图引向纵深时都猝然中断,正说明在主流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压制下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议题。在这场多次发起而又中断、历时十年的争论之后,2007年左右主导文化观念逐渐成为欧美文化保守主义的共识,并以多样的表述形式被纳入各国中右翼传统政党的党纲。伴随着欧洲伊斯兰化的不断加深和2015年难民危机的急剧激化,主导文化观念在欧美政治文化语境里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关于移民融合的讨论里也成为对抗多元文化主义最有效的理论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新兴的反伊斯兰、反欧盟的偏右翼政党如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等,都不约而同地在纲领里旗帜鲜明地采用了本国主导文化或捍卫本国传统文化价值等相似的提法,以此

^① 哈贝马斯等左翼思想家往往就这一点认为,并没有在《基本法》和宪法爱国主义之外另提主导文化的必要,因为宪法的基石即是现代西方民主自由的基本秩序。

^② 例如一直深耕地方的法国国民阵线提出“原生文化”或“根基文化”的概念,要求保护、更新那些传统的地方性节日庆典集市活动如狂欢节、啤酒节、葡萄酒节、圣诞市场等,以塑造坚实的原生自然文化秩序;而德国传统政党、主政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也提出,巴伐利亚要永远保持为巴伐利亚,不会在欧洲穆斯林社群的压力下取消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节日如圣诞节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节日如慕尼黑啤酒节,也不会引入伊斯兰节日。

^③ 游斌:《民族与宗教互动的欧洲经验》,载《中国民族报》,2008年5月6日。

赢得了大量民心。^① 尤其危及传统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是,这些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倡主导文化的政党在难民危机里基本已经跃居各国第二、三大政党,而且联合组建了若干欧洲保守主义党团,对欧洲政局甚至欧盟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②

在目前欧盟复杂的认同危机、移民融合和难民危机中,面对移民潮的不断加剧和移民群体的日益壮大: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之宗教、文化、习俗合法权利要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并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宽容,渗透在所有媒体、教育界和政界,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认的观念甚至超级意识形态,在欧洲社会内部依旧约定俗成和持续运转;另一方面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盟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人权话语和选票压力使占据人口结构相对优势的移民社群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在老龄化、出生率低下欧洲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在推广主导文化主义的政策框架中,由于欧洲各国宣扬的主导文化实质上根源于基督教历史传统,使伊斯兰属于欧洲还是不属于欧洲的问题浮出水面,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对抗越来越严重;随着各国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大幅减少接收移民和难民的数量、削减少数族群的相关福利与取消双重国籍,驳回或限制穆斯林要求公开穿戴头巾、布卡和禁酒等与伊斯兰教法宣示相关的诉求,也必然会引起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的更多怨恨,很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族群分裂而导致恶性循环。

四、结 语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和文化始终是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在与他者的交融碰撞之中沉淀而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加速度增长的全球社群迁移带来了更多的矛盾和挑战,而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持宽容态度并承认少数族群合法权利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国家的基本共识。然而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欧洲各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却使民族、族群和文化的界限固化与泛政治化,使外来移民日益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和严峻政治问题。如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所指出,移民“使情况复杂化”,移民问题是当前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之政治困境的全方位、最集中的体现:“松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续了五十年,使得社会融合陷入了失败境地”,导致社会内部出现强烈的紧张,“从举国团结陷入国内对抗”。^③ 在现实中,移民是否能够融入欧洲本土社会,不仅仅涉及经济平等和政策调整,还有着更为长远的人口、政治、宗教和社会等立体层面的影响。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虽然公开表示,本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然而这种“失败”是就移民政策而言,是移民政策执行路径的调整。以普遍人权话语和自由主义理论为根基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在公共领域根深蒂固地笼罩着欧洲福利国家。福山曾经指出,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自由社会倾向于微

^① 奥地利自由党在党纲里指出,奥地利不是移民国家,要捍卫由语言、历史和传统所决定的主导文化。FPÖ, *Parteiprogramm der Freiheitlichen Partei Österreichs*, Graz, 18. 06, 2011. 法国国民阵线的2017年144条大选纲领,将捍卫民族认同、法语、法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同化取代融合提到突出的位置。FN, “144 Engagements présidentiels Marine 2017”, <https://www.marine2017.fr/wp-content/uploads/2017/02/projet-presidentiel-marine-le-pen.pdf>. 德国选择党则在党纲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下列主张:维护德意志文化、语言和认同;德意志主导文化必须取代多元文化主义;德语语言是德意志认同的核心;伊斯兰不属于德国,允许公众对伊斯兰的批评,禁止国外对清真寺的资助,公众场合禁止蒙面等。AfD, *Programm für Deutschland*, Stuttgart, 2016.

^② 例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意大利北方联盟、荷兰自由党和波兰新右翼大会联合组建欧洲议会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英国保守党、捷克公民民主党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联合组建“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党团;英国独立党、瑞典民主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联合组建“欧洲自由民主”(Europe of Freedom and Direct Democracy)党团。这些党团通常具有反欧盟、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因此也往往拒斥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而倾向于各种形式的本国主导文化的主张。

^③ “French Police Breakup of Immigrant Squat Brings Storm of Protest”, *The Guardian*, 02. 08, 2010.

弱的身份认同,欧洲后现代精英尤其觉得自己已经超越单一宗教和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确定积极的自由价值基础,不能明确“我们是谁”,必然将遭受身份意识认同强烈的移民的挑战并被其所吞没。^① 2015年以来上百万穆斯林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欧洲不断弱化的基督教社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也给原本已经很严重的族群冲突增加了新的巨大能量。

近些年来这一悲观的思潮在欧洲本土民众中迅速膨胀,即欧洲各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与民族认同正面临被大规模移民浪潮尤其是伊斯兰化吞没的风险。201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匈牙利(72%)、意大利(69%)、波兰(66%)、希腊(65%)、西班牙(50%)的民众对本国的穆斯林移民社群持负面看法。^② 2017年2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对欧洲十个国家进行超过1万人的问卷调查,55%的欧洲人认为应该停止接收新的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欧洲,即实行某种形式的“禁穆令”,各国具体的赞成比例分别是波兰(71%)、比利时(64%)、奥地利(65%)、匈牙利(64%)、法国(61%)、希腊(58%)、德国(53%)、意大利(51%)、英国(47%)和西班牙(41%),这里面不少是深受难民危机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困扰的国家。^③ 正是在这一民意基础上,欧洲各国近些年兴起的新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奥地利自由党和荷兰自由党等的共同主旨是反欧盟、反伊斯兰化,并不约而同提出了种种试图遏制本国文化认同继续分裂和限制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竞选纲领。这种反抗二战以来主流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层民意动向,正在喷涌而出并日益明显地改变着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格局,也更深刻地凸显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面临的内在困境及其深刻危机。在这样的现实下,今天积重难返的欧洲面对的不仅仅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也是刚刚走上现实舞台的主导文化主义和全面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确定未来。

Abstract In the several waves of immigr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a nationalistic Europ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multicultural Europe. Step by step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abandoned the immigration policy of “exclusion” or “assimilation” and took a public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embracing an inclusive and diverse society with a more open attitude to immigrants. However,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multiculturalism is no longer seen as an answer to but rather a cause of Europe’s social problems, for example, parallel societies, conflicting values, brok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growing religious conflicts. Whil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ulticulturalism took place, the idea of a “dominant culture” (Leitkultur) gradually surfaced. However, in the largest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since 2015 where multiculturalism has met its downfall, the policies of “dominant culture” and “full assimilation” both have an uncertain future.

(鲍永玲,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0235)

[责任编辑:罗 薇]

^①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25. 02, 2007.

^② Richard Wike, Bruce Stokes, and Katie Simmons, “Europeans Fear Wave of Refugees Will Mean More Terrorism, Fewer Jobs; Sharp Ideological Divides Across EU on Views about Minorities,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2016.7.11, <http://www.pewglobal.org/2016/07/11/negative-views-of-minorities-refugees-common-in-eu/>

^③ Matthew Goodwin, Thomas Raines and David Cutts, “What Do Europeans Think About Muslim Immigration?”, 2. 7, 2017,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what-do-europeans-think-about-muslim-immigration>